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国学与汉学

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桑兵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3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国学与汉学

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桑兵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Z126
S0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桑兵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749-2

I. ①国…

II. ①桑…

III. ①国学-文化交流-中国、外国-近代②汉学-文化交流-中国、外国-近代

IV. ①Z126②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505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国学与汉学

——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桑兵 著

Guoxue yu Han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8.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3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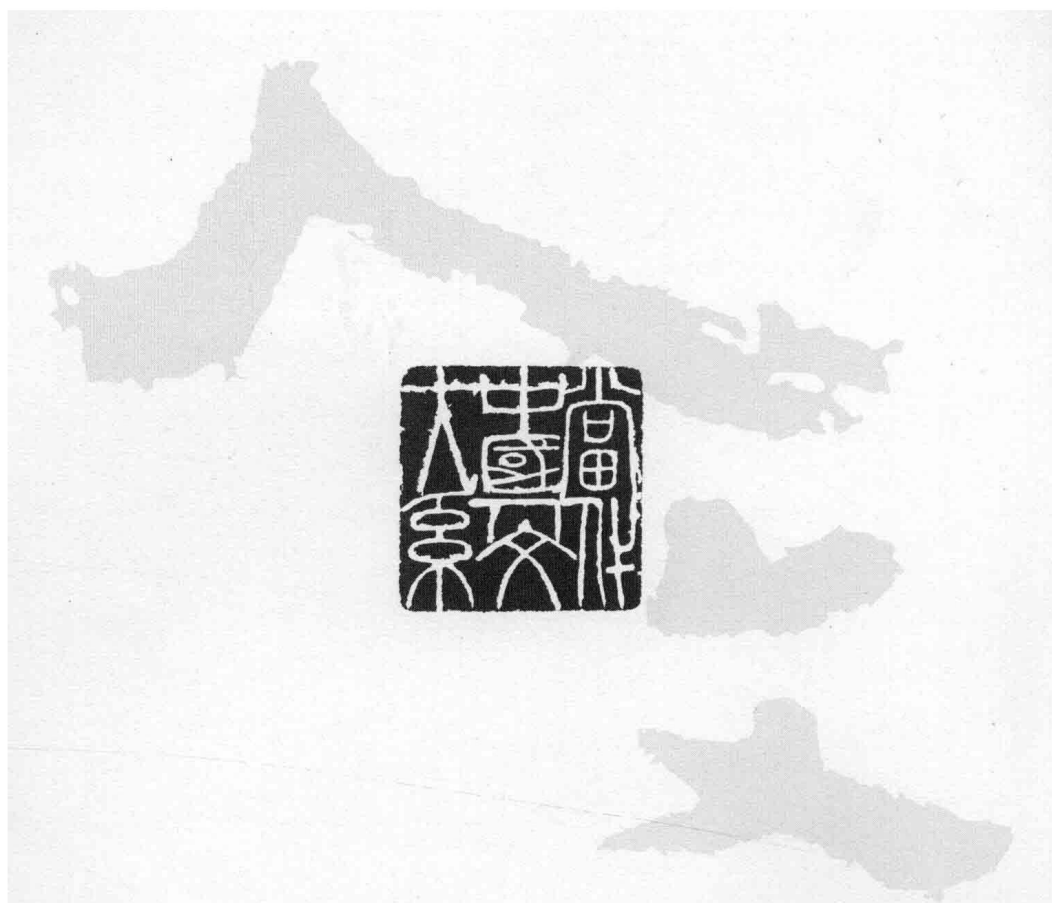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专著有《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等，主编有《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清代稿钞本》等。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涌现大量史料，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得以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界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况趋势，并把握个人及流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进而探寻新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正途大道。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崔晓丽 吕鹏军
装帧设计 三众工作室 / 耿中虎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缘起	1
第二节 学术史	7
第三节 方法	13
第一章 四裔偏向与本土回应	21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21
第二节 方法与文献	25
第三节 欧风美雨论高下	31
第四节 发现与发明	38
第五节 了解之同情	43
第二章 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学者	49
第一节 巴黎学派正统	49
第二节 西北欧各国	57
第三节 从沙俄到苏俄	68
第四节 新大陆的影响	77
第三章 沟通欧洲汉学的先进	
——陈季同述论	82
第一节 “留学”与随使	83
第二节 折冲樽俎	88
第三节 私债风波	92
第四节 保台到革政	96
第五节 楚材晋用	102
第四章 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	106
第一节 敦煌劫宝	107
第二节 礼尚往来	113
第三节 文雅的树敌艺术	125



第四节 盖棺论定	133
第五章 胡适与国际汉学界	138
第一节 留学结缘	138
第二节 贵族与帝师	141
第三节 来华同好	146
第四节 欧游识名家	155
第五节 关怀东亚	164
第六节 彼岸炎凉	175
第六章 东亚各国的学术交流	
——以中国研究为中心	180
第一节 游历与新兴东洋学	180
第二节 中日学术交往	187
第三节 朝鲜与蒙古	198
第四节 由媒介而通道	203
第五节 魏建功与金九经	210
第六节 还期相敬莫相轻	214
第七章 近代日本留华学生	221
第一节 留学乎？间谍乎？	221
第二节 学问的留学生	229
第三节 学习与生活	234
第八章 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	243
第一节 肇始与先驱	243
第二节 “耳痛”的书评	248
第三节 角逐东方文化事业	254
征引文献	259
人名索引	277

绪 论

第一节 缘起

此书缘起，当在 1994 年初即将结束客居日本的研究生活之际。归国前，我从东京去银装素裹的京都查阅史料，蒙狭间直树教授相邀，在他主持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梁启超研讨班例会上做报告。还在博士论文的修订期间，我即注意到晚清民国时期学界风潮锋芒所向的教职员中，不少人是当时的学问大家，他们在近代中国学术的转折期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不是仅仅从学潮角度立论所能认识清楚的。因此，在集中精力关注近代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一课题的同时，注意收集有关近代学者的资料。此外，因为研究甲午至辛亥海内外中国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对于和政治关系密切的梁启超了解较多，于是选择“梁启超与近代学术”为报告题目。

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涌现，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或以为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何以学问独盛？言下之意，颇疑立说者居心叵测。其实学术文艺等事，虽不能脱离社会基础，乃至有人称第三世界的学者只能做第三世界的学问，其兴却往往不在太平盛世。纵观古今中外，乱世出学人，绝非例外。正如 1932 年孙楷第函告陈垣：“窃谓吾国今日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① 近代学问大家，对于清学用功颇深，源流脉络，长短利弊，了解周详，虽见仁见智，不无微词，但变换角度，亦可谓心得独多。清学极端发展，得失清晰凸显，适为近代学者奠定更上层楼的基础。认识和把握清学史，正是近代学者超越前人的妙诀之一。与此相较，当代学者对

^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9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于近代学术史可以说相对隔膜，海外亦然。而且世风流变，当时口碑与事后评价乾坤颠倒者不乏其例。其原因禹内主要在学术以外，而非如时人所谓忘怀，域外则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学风激变。虽然原因不一，均使后来者临歧徘徊，无所适从。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者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况趋势，并把握个人及学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这或许能够弥补专而偏的局限，见木见林，相辅相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时代之学术，须经时间检验，才能分别一时之俊与百代之英。世纪回眸，几度浮沉之后，前贤的历史地位大体依所贡献而适得其所，后学亦可摆脱非学术性制约，从容煮酒论英雄。欲知 21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道何在，应对近代学术史的利弊得失详察深究，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为其中重要内容。如果说不通域外不能知近代史，那么不知中外学术交往，则难以恰当体验近代学术发展。国际汉学家对于近代中国学术及学者的评点，往往不止衡鉴而已，尤其是那些纯就学术立论，因而与禹内公意不尽相同的真知灼见。以几位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家而论，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中外一致，对梁启超、胡适的看法则相去甚远。据传一位中国学人访美，和一位美籍学者谈及胡适，前者说胡适学术上有贡献，政治上很差。后者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认为其政治很好，学术很差。政见分歧，缘于双方立场观念不一，不难理解。学术评价如此悬殊，值得玩味，其中凭借依据不同，或为重要原因。国人论学，往往纠缠于思想学术，将社会影响作为学术贡献的参考。

不过，真正高明的学术，毕竟难以领悟。所以对于陈寅恪，本土学者（包括海外华人）虽不乏推崇备至之人，域外汉学家多少有些莫名所以。而且本土学者的认识，大都限于其壮岁成就，至于晚年之作，仍然曲高和寡。陈寅恪治学，前期虽经留学同人的大力举荐和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家的品题，学术界还是看法不一，不少人有所保留。

1932 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别时贤为三类，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



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一为博辩多识，“鉴古今之源流，知中外之旨归，学非一途，业有多方。著书立说，亦能提挈纲领，务去陈言。规模既宏，众望所归。为当代之闻人，有激扬之令誉”。前者当指胡适，其次则章门弟子，最后似为陈寅恪。“综斯三途，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间；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煊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此可谓一时之俊，未可谓百代之英也。”在孙楷第看来，“名浮于实者一而已，实浮于名者则百世而下其名将益彰。后生小子所须要者为实浮于名之前辈，非名浮于实之前辈。凡夫庸流所震荡者为名浮于实之闻人，其实浮于名者，或不能尽知。一为社会的，一为真实的。”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①。照杨树达的评语，不能既温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门非庸即妄。^②而将陈寅恪与之匹配，则显然仅据其前期成果，主要由朴学传统着眼立论，不了解学术背景，似缺乏洞见。随着陈寅恪本人学术的发展和学界风气的演变，得到普遍公认大概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来则或大起大落，或毁誉不一。时至今日，学人排定陈寅恪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仍依各自的性情近于考据或文化类型，而不免徘徊于史料与史观之间。

近代世界学术史上，中国研究的状况颇为特殊。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至今仍然持续，史料大量留存，关注者极为广泛。异文化出身的研究者为数之众，在世界文化之林恐怕首屈一指。20世纪以来，有关研究在海内外各成风气，虽然相互交流影响，仍各有不同的路径。在欧洲主导近代世界思维的背景下，域外汉学不仅自成体系，甚至有超越和制导本土研究的趋势。而其他文化体系，或传统中绝，内外研究者起点相同；或异文化关注者少，结果非由人主宰，即本土独霸。中国研究却早有资料依靠禹内，方法求诸域外

① 《陈垣来往书信集》，409~410页。

② 杨树达谓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前者指黄侃，后者指胡适。

之说。近代中国百事不如人，学者对于中国研究落于人后不免耿耿于怀。陈垣、胡适、傅斯年等慨叹汉学或东方学中心不在中国，呼吁努力夺回，陈寅恪甚至因文献遭劫，中国学者贡献于敦煌学少而叹为伤心史。从20世纪30年代起，欧美学者渐有由日文论著入手治汉学之端倪，当时中国学者深以为耻，力图扭转。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征兆蔚为风气，反而愈演愈烈。国人不仅因中体动摇而自毁体系，似乎对国际汉学的批判能力也日趋减弱，使之日益脱离本土学术的制约。有学者以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如果脱离中国人的阅读批评，自成一个世界，实在是最畸形的事！对于我们也是很可耻的事！以历史为生命的中华民族，是不应该懒惰到有如此‘雅量’的。”^①不幸事实正是如此。

对于中国本土研究的批评乃至忽视，包含各种因素。强调客观性者立论角度往往不在学术本身，所说实为敢不敢和能不能的问题，并非见识高明，可以略而不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是来自最注意中国学者研究成绩的巴黎学派与京都学派的意见。京都学派几代传人历来自诩第二，乍听以为自谦，其实是头甲纵然难求，二甲舍我其谁的自信表现。其开山鼻祖之一的内藤虎次郎对于巴黎学派亦当仁不让。20世纪初京都学派能够迅速崛起，与巴黎双峰并峙，成为国际公认的汉学研究中心，并非浪得虚名。斟酌其对包括本土学者在内的世界中国研究者所分三六九等，确令神州学人汗颜。当然，由此可见本土的研究即使就方法而言亦不容忽视。

中国学术，从来以经史为大道正途，其余则雕虫小技。近代学风变迁，经学解体，史学独盛，杂学丛生，各胜擅场，所谓附庸蔚为大国之事，不胜枚举，但仍有主次之分。王国维治学前后凡三变；愈近大道而趋精深，晚岁缄口不谈早年所治哲学美学，甚至将好评如潮的戏曲研究也束之高阁。而治学良法，不外考据、义理、辞章。今人提倡史学的严谨、哲学的思辨、文学的风采，当脱胎于此。以治史而论，三者皆备最佳，其次则兼具前两项，至少须知考据。治史首重求真，失真则无信史。单凭考据，可治有形之史实。日本的中国学和东洋学，虽不免琐碎，日积月累，基础巩固，方面扩展，蔚为大观。美国的中国研究，造就大批标准化的博士，亦能凭人多势众凌驾于巴黎学派正统。反观中土，上焉者亦不免以思辨、文采

^① 梁容若：《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代替实证求真，于理应阙疑处有所取巧，甚至天马行空，任意驰骋；等而下之者更是侈谈义理，苦熬文章，用心不浅，可惜多从史料外面看的格义附会，似是而非；遑论还有以抄撮代著述，裁补剪贴，粗制滥造的赝品制造商；因此从来为国际汉学界非议诟病者不少。先哲有言：读书当与古人较，当自以为愚。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弊端之一，或学人往往自以为智，因而天才想象和文人气质难受真理与逻辑的控制。守成尚且力所不逮，却竞相推陈出新，结果陈义纵高，作品数量亦复不少，却连基本规范也达不到，不仅形同废品，还会误人害世。

近代国际汉学的方法，虽然轨则不一，基本倾向是重在发现，可概言之为止找材料。中国传统治学则首重发明，先读完书以求贯通，才能不失之于偏蔽，因而贵通人而不重专家。中外学风互为激荡，由此而生博通与专精、预流与趋时的关系，均须从理解彼此学术的异同中领悟把握。为学之难，不在于能写好文章，而在始终不讲外行话。欲臻此境界，前提即为通方知类。就此而论，近代中国学术界成就最高的三位学者，王国维之蔽显于早年，陈垣之蔽见于晚岁，都有不当之文；而所蔽主要在西学一面。^①只有陈寅恪天缘巧合，得以沟通古今中外，再从容论学。其所治之学，虽前后亦有变化转移，但绝无悔其少作或晚节有亏之事。在历经剧变的近代学术史上，实为凤毛麟角。梁漱溟的坚持异见颇为海外学者引为文化守成的中流砥柱例证，其为学却无论中外，大抵是依据体验的格义附会而不自觉，因而其坚定多少缘于信仰。

从学之初，或谓成名要津为“亦官亦学”，即以官威造势，带动学问。这大概是那一时代的学人凡名气大者位必高的现实反映。然而入学愈深，愈知此说误人害世之甚。虽然中国历来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从政与治学之道毕竟两歧。在向学之途上凭借金权，无非想饰己之短，夺人之长。淆乱学界视听，莫此为甚。还在20世纪20年代，有人就指出：“在我国历史上凡是有名的学者，固然都是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舞台上或台后发生过关系，但是如果政治生命断送愈早，或不甘失足而回头愈早的人物，便是学术史上愈有深造的人物。”^②不过这是80多年前的看法，当时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获赠法国

① 今人批评陈垣，多从政治角度立论，其实陈垣对西学新法历来怀有崇敬之心，此为晚年变向的学术潜因。

② 郑师许：《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载《新闻报》，1929年2月17—18日。



博士学位，学术界传为笑柄，与后来的风尚多少有些不同。那一时代的纯粹学人，每以从政为畏途，杨树达甚至“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①。

因此，影响近代学术的政治，主要还不是政务，而是政论。前者与学术的关系，清浊分明，后者却扑朔迷离。梁启超与胡适，便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学术，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指示来者轨则，而梁任公、胡适之领导时代潮流。梁与胡的贡献作用，主要在思想一面。至于学术影响，生前虽然位高名重，而非议亦多，身后更难免低昂。但两人均凭借传媒以思想鼓动大众，又转而作用于学术，甚至以传媒方式倡导学术，结果从之者愈众，则流弊愈广，造成大小以任公、适之自命的学术畸人。对此，王国维早已表示异议，认为只有以学术为目的而不是以政论为手段，中国学术才可望发达。《学衡》派诸人也指责“政客式之学术家”的“霸道之学”。^②《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争论的要点之一，正是学者与思想鼓动家、学术研究与政治鼓动的差异，尽管他们也不自觉地在思想层面进行回应。作为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堂堂北京大学，竟然将社会影响正式作为教师升等的四项基本条件之一，难怪北大派竞相以传媒造势，形成传统。近年有人提出超越胡适之说，仍是分不清思想与学术的表现。就思想论，无所不知的君子时代似已过去；就学术论，悬胡为的，立意本来不高。

在科学主义盛行之时，北大国学门出身的容庚曾经评论道：“方今学风，喜欢疑古，于古人的制度文物学说无所不疑，那知意念一偏，万物纷错，随而转变，所谓看朱成碧，最是学者一大毛病。胡适之先生述学，用敏锐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来批评古人，故所得的成绩很不错。流弊所及，后生学子，于古书未尝深造，辄逞其私智，就主观所得随意抄录，加以评鹭，愚己惑人，以为猎名的工具。胡先生在讲坛上常对此大发其牢骚，并说述学之不易，须知‘怀疑’与‘求证’相联，万不能易‘求证’而为‘武断’。”^③

此说看似褒扬胡适，其实是将乃师王国维与胡适的方法做一分

① 《积微翁回忆录·自序》，1页。

② 参见刘伯明：《学者之精神》，载《学衡》，第1期（1922年1月）；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载《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③ 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5期（1925年11月11日）。

别。前者主张读书，后者实为找材料。王国维以为“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①，这不仅批评疑古派，也针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科学主义。因为“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细帐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帐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②。萧公权也主张在假设与求证之前，应有一放眼看书的阶段，以免“思而不学则殆”^③。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往往在立论之后才大量补充材料，虽因悟性高而不至于大谬，毕竟有先入为主之嫌。选择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为题，用意不在申明其贡献，而在指出其流弊。用以比较的对象，主要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后来写成的《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一文，虽然主角变换，立论基本是那次关于梁启超报告的引申。

现在反省，当时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了解仍然表浅。尤其对于学者的身世交游缺乏足够认识，连王国维号观堂缘于京都亦蒙小野信尔教授赐教，论人论学，很难入木三分。或许因为对梁启超贬义过甚，讨论时有学者提出，评价学术，除非评论者的见识超过所评对象，否则难以征信。欧洲学者亦有人见解相同。此说多少有点悖论的味道，值得一评的前贤往往名重，后学高明与否，须待时间检验。但由此所得启示，是必须解决研究学术史的方法问题。追寻前人的相关研究，可为入手前提。

第二节 学术史

“汉学”这一译名以及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历来认识不一。“国学”概念的争议更大，傅斯年等人甚至根本反对用这一名词来涵盖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欧洲汉学本身并无后来学术界所认定的藩篱，国学也几经转折变化。从历史学的角度看，由发生过程的复杂事实来综合认识模糊概念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比在抽象的语义学层面讨论其内涵外延更有助于理解其实际涵义，因为任

① 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见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16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②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载《幼狮文艺》，第47卷第6期（1978年6月）。

③ 《何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7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